

编者按：6月22日是中国大运河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6周年。6年来，大运河沿线省市不断加强运河保护，古老的大运河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江苏作为大运河起源地和申遗牵头城市所在省份，娄勤俭书记多次强调，要系统推进我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让人们一提到运河就想到江苏，欣赏运河之美首选到江苏，研究运河文化必须到江苏，展示运河形象全国向往着江苏。

中国大运河上下2500多年，绵延3200多公里，贯穿8个省市，沟通5大水系，跨越10多个纬度，哺育了35座城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这条以人工之力开凿的水系，贯通南北，沟通了华夏大地上的庞大水网，打破了地域界线，成为中国南北经济与文化的命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2500多年来，大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繁荣社会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生动记录着国脉的世代赓续，传承着民族的璀璨文明。推动大运河文化建设，有利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有利于赋能沿线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旅融合脊梁带；有利于推动区域间统筹协调，形成文化发展命运共同体，打造区域合作样板，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江苏作为孕育大运河的摇篮，被运河滋润的历史最悠久。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孕育了在中华文化中绽放异彩的大运河文化带江苏篇章。目前，大运河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其中四分之三在江苏境内。根据其利用强度可分为两个区段：一是山东济宁—江苏镇江段，也称长江以北区段。本段航道底宽水深，是长江以北大宗散货内河主要运输通道，地处江苏、山东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肩负“后发赶超”的使命，其经济承载力接近饱和。二是镇江—杭州段，也称长江以南区段，本段底窄水浅，两岸是繁华的生活贸易中心和运河货物交易集散中心。只有把现代化的商业业态和新产业新技术与大运河传统的经济形态嫁接融合，深刻塑造大运河现代化的商业生态和文化气质，才能让千年运河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力。

本期推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多维度深刻理解大运河文化内涵，分析大运河文化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提出相关高水平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策略与路径探讨。同时希望能为盐城市相关政府部门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利好期，深度开发运河文化遗产资源，挖掘盐城市与其相关的文化价值，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思索和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期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 02 高标准高水平高品位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 05 多维度深化大运河文化内涵认知
- 06 大运河文化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调查分析
- 09 塑造大运河现代化商业生态和文化气质

全球大观

- 11 论中美战略竞争

经济纵横

- 17 从当前经济形势看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文化漫步

- 19 新时代世界文学教材观念创新

悦读时光

封三 2020年高考：一场特殊的“成年礼”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黄兴港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盐城银河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0年7月16日

印 数：5600-5800

高标准高水平高品位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起势很好、成效明显，各地各部门思想共识高度凝聚，顶层设计基本形成，工作举措不断创新，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大运河立法、文旅基金设立、研究院组建、出版工程实施、大运河博物馆建设等具有开创性意义，世界运河城市论坛、首届大运河文博会等成功举办，推动江苏运河文化走向世界，充分体现了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追求和积极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全省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扛起历史责任，高标准高水平高品位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传承中华文脉交出时代答卷，让千年运河留下新时代的江苏印记。



一、深刻理解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极其深刻又极为形象地指明了大运河的特征和重要作用。平时我们大多从资料上看大运河、部分地了解大运河，这次调研，真正行走在大运河上，才更深刻地理解了总书记为什么说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才更真切地体会到大运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大运河是流淌千年的一脉活水。这几天，我们乘船从徐州沿运河而行，看到河面很宽阔、运输很繁忙，充满了生机活力。有不少人认为，大运河已经是历史之河了，很多地方河道都干枯断流，发挥不了多大的运输作用。事实并非如此，大运河江苏段至今仍然水量丰沛、通航良好。这次看了，实际情况还超出预期，特别是流经徐州后三度“借湖行运”，与骆马湖、洪泽湖、高邮湖融为一体，河道最宽的地方接近2公里，综合功能保存也最为完整，通航里程达687公里、占总里程近3/4，年货运量约4.8亿吨，这样的运力就是与长江一些区段相比也毫不逊色，我们去看的扬州邵伯船闸，年过货量高达2.5亿吨，是长江三峡船闸的近2倍，还创造了日通过108万吨的全国内河船闸最高纪录。不仅如此，江苏段还是江水北调、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主要通道，调水出省超过40亿立方米，源源不绝的运河水滋养了苏北以及更北地区的广袤良田，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吃水问题。由此可见，大运河虽流淌千年，但至今仍奔腾不息、生机勃勃。

大运河凝结着先人的智慧结晶。大运河很多治水、漕运、水利开发工程设施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我们的祖先创造性解决了开源、蓄水、地形、洪沙等诸多水利难题，高超的治水智慧、水利工艺，现在都让人赞叹不已。我们看了淮安的清口水利枢纽，确实非常了不起，“借自然之力以用之”，在水系格局极为复杂的情况下，以束水攻沙、蓄清刷黄之法解决了漕运畅通的大问题。这个方法，黄河治理至今都还在沿用。大运河流到扬州境内，水流急转直下，古人为了抬高水位、减缓流速以保漕运，把一段直线百米的河道改成1.7公里的三道弯，这也是一大创造。在扬州考察时，我们登上高台俯瞰，“运河三湾”尽收眼底，每一道弯都淋漓尽致体现了古

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这种智慧理念对扬州整座城市的规划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这些工程是大运河江苏段灿烂水工文化的缩影，凝聚着高超的水工智慧。刚才，水利部门的同志也作了汇报，我特别感慨，水利工程建设确实是利在千秋的大事，一代代江苏运河人继承先人智慧，没有停下开凿、疏浚、修缮、治理的脚步。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运行40多年依然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泵站枢纽，堪称现代水利工程的典范。现代科学技术赋予水工文化新的活力，大运河积累的祖先智慧随时代不断进步、福惠后世子孙。

大运河是熠熠生辉的文化瑰宝。沿运河走，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运河生则城市生、运河兴则城市兴。大运河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孕育滋养了一座座名城古镇，大运河文化也在城镇繁华和人民生活得到“活”的传承，光是我们江苏段，就座落着1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12座历史文化名村，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化遗存，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有28处。徐州自古是运河中段的重要枢纽，我们去看了户部山，明清古院落和建筑群鳞次栉比，记载反映了西楚、运河、建筑、民俗等各种文化绵延叠加、交融影响；我们考察的宿迁皂河镇龙王庙行宫，是全国众多乾隆行宫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保持最为完好的一处；淮安有“中国运河之都”的美誉，一条里运河完整记载了淮安漕运文化、河工文化、江淮文化的集中性和代表性，盱眙县古泗州城深埋水下330多年，几年前经考古发掘后重现天日，从出土的大量文物，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个“水陆都会”的繁盛；扬州作为“中国运河第一城”，早在隋唐时代就以“十万人家”“十里长街”繁华而著名；运河沿岸还有邵伯、河下、皂河、窑湾等众多古镇枕河而建，穿越千年时光。考察期间，我们行走在名城、古镇的街巷之中，处处都能感受到大运河的活力和文化浸润，这些地方不仅依旧商家林立、熙熙攘攘，人们还可以欣赏到南北交融的园墅楼台，聆听南北大戏里的运河故事，品读四大名著与大运河江苏段的不解之缘，或是领略非遗传承人的匠心技艺，这些特色浓郁的文化元素，都源于大运河的南来北往，融入了寻常百姓生活，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福祉。

所以，总书记讲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不仅仅在于大运河是运输水道，更是传承千年的文化动脉；是经济带，更是丰富多彩的城镇带、文化带。可以说，大运河是活着的文化载体，是滋养江苏发展的生命之河、灵性之河。

二、以科学的理念统筹推进保护传承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出了“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要求，我们要深刻领会、坚决落实。江苏段作为大运河的核心段，是全线历史最悠久、文化遗存最丰富、活态利用最好的河段。国家《规划纲要》中江苏纳入核心区的县（市、区）、纳入六大文化高地建设的城市数量、纳入国家工程的重大项目也是运河沿线省份最多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也明确大运河江苏段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唯一的重点建设区。全省上下一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立科学的理念、发展的眼光，把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把江苏段打造成为走在全国前列的先导段、示范段、样板段，让这一“流动的文化”在新时代更加熠熠生辉。

文化保护传承要有“继往开来”的思想。大运河的每一段河道、每一座水利工程、每一个古建筑，甚至是一种曲艺、一口方言、一门手工艺，都是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做好保护传承工作，一方面要“继往”，明确这些大运河文化遗产和关联资源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做好沿线重要文物考古、研究和认定，摸清底数、建立档案，抢救性保护濒危非遗项目和历史文化风貌，决不能割断历史文脉；另一方面要“开来”，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多角度挖掘和展示大运河文化内涵和现实价值，推动大运河从“地理空间”走向“文化空间”，让大运河丰富的历史遗存从静态变为活态，让运河文化在现代活化复兴，更好地服务今人、传承后人。

环境治理修复要有“道法自然”的态度。大运河是先人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今天，我们保护修复大运河生态环境，同样要遵循自然规律。在扬州调研期间，我们看到古人为治理洪害而兴建的七河八岛、归江十坝，都是尽量避免与洪水正面交锋，顺应水流动的规律，在水满时引导入江，在水少时蓄水以用。我们要传承古人的这种理念，实施柔性治水，修复河道自然形态、湿地系统，构建自我调节、自我净化的运河水系。要遵循历史规律。大运河沿线历史遗存都经历数代兴筑演进而成，展示运河文化一定要拉开历史维度，展现历史演变、经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变迁的完整过程，体现历史纵深，并与现代文明串联起来。保护修复历史遗存，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的古镇、历史遗存本来就枕河而建，应当在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原貌的前提下进行保护。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不能孤立看待文化遗产，而是要将运河文化与地域文化、人文、

风土、民俗等文化附载一体保护，注重建筑风貌与文化内核的一致性，在加深对文化内核认识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周边整体环境。古建筑是运河文化的生动讲述者，我们考察途经的宿迁皂河古镇，北方宫廷式古建筑群和大量明清宅院相得益彰，体现了皇家宫苑文化与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的交融。文化是活的，建筑也是活的，对古建筑的修缮，既不能搞破坏性修复，也不能空有一个仿古的样貌，或是修建几间传统的房屋，而是要延续传统建筑风格、恢复原有风貌风土、表现历史文化符号，用建筑语言解读好运河文化，与老百姓生活相融，真正做到修缮一片搞活一片。

资源开发利用要有“融合共生”的理念。要把功能发挥作为基础。在不少地方运河河道干涸的情况下，江苏段的综合功能依然活跃，这是我们推动大运河江苏段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基础。要始终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一宗旨，充分发挥大运河在交通运输、水资源利用、农业生产、防灾防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让大运河更好地融入当代、服务为民、造福于民。要与产业发展相互融合。用好用活大运河这个蓄积千年文化势能的“超级IP”，创新文化发展模式，把运河文化内化到产业形态中去，打造承载运河记忆的旅游精品线路，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形成水系特色明显的文化经济带。要与城市建设交相辉映。坚持“城河共荣”“景河共生”，将运河文化融入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之中，追求水与岸、河道与建筑、功能设施与文化景观的协调之美、整体之美，使城市风光与运河风光各美其美、交相辉映，为大运河文化注入新时代的青春活力。要与乡村振兴统筹起来。依托运河沿线的水、文化、生态、农业等资源发展一批富民产业，打造一批像窑湾、皂河、河下这样的运河特色小镇。

三、用项目化思路推进国家规划落实

根据国家《规划纲要》，我省已经制定印发江苏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接下来关键是要落实，着力点在项目建设，要坚持以项目化思维来推进任务落实。

一是要体现至高性。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和工程量最大的人工运河，代表了人类运河文明的巅峰水准，这是其他国家运河特别是内陆人工河道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开展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一定要有历史的视野、长远的眼光，努力建设一条与大运河的历史地位、资源禀赋、时代要求相匹配的高水平文化带。从目前来看，我省已排出的项目数量很多，但

体量都不大，特别是独树一帜、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项目不多。要进一步做好项目整合包装，集中力量推进“国字号”、有影响力的大项目，体现江苏在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上的最高水平，决不能因为认识不足而留有遗憾。对扬州大运河博物馆、淮安水工科技馆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品质建设，体现最高目标追求，建成传世之作，成为区域性标识，经得住历史检验。

二是要注重系统性。大运河集运输、水利、文化、城市、建筑、生态于一体，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这就决定了单独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搞不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调研时我一直讲要“保护第一、服务发展、造福人民”，就是要求坚持系统性思维，把握好文化大系统与其他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优先次序，既要突出保护这个大前提，系统推进沿线文化遗产保护、河道水系治理管护和生态保护修复，又要兼顾好航运发展、水利兴建、产业开发、城乡建设，更好地发挥大运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保障作用。在具体工作中，对于每一个项目、每一段河道、每一处风貌，都要充分体现在整个文化带中的定位和作用，做好细致、统一的规划，使每一个单元都能成为传承运河文化、做强运河品牌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要坚持创新性。对于大运河文化中的精华，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很重要的是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创新表达形式、突出地域特色。这次调研看到，一些项目建设还存在同质化现象，一些博物馆展览馆缺乏实物支撑，文化呈现不够鲜活、特色不够鲜明。要坚持一馆一主题、一馆一特色，征集展示一批代表独特地域文化的文物史料，善于用现代科技表现手法，用精致优美的笔触，书写好别人模仿不来的运河故事。要在资金投入、要素保障、区域联动、监督管理、考评激励等方面创新体制机制，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保障支撑。

四是要严守规范性。我省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大运河立法，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法治完善决策、规范行为、推动规划实施，确保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始终运行在法制轨道。要严格履行项目论证、审批程序，杜绝未批先建、超越红线等情况发生，对于违背规划、乱占滥用、影响文化和生态安全的设施，该拆除的要坚决拆除，对于有些符合规划但是手续不全的项目，该完善的要抓紧完善，避免违法违规，确保文化和生态安全。

(2020年7期 群众)

多维度深化 大运河文化内涵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推动大运河文化建设，有利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有利于赋能沿线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旅融合脊梁带；有利于推动区域间统筹协调，形成文化发展命运共同体，打造区域合作样板，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今年6月22日是中国大运河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6周年。6年来，大运河沿线省市不断加强运河保护，古老的大运河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大运河是目前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它始建于春秋末期，全长3200多公里，贯穿8个省市，沟通5大水系，跨越10多个纬度。2500多年来，大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繁荣社会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生动记录着国脉的世代赓续，传承着民族的璀璨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推进大运河文化建设，保护是基础，传承是方向，利用是动能；而一切的逻辑起点，是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刻认知。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只有多层次、全方位、不间断地深化对大运河文化的内涵认知，读懂大运河的文化含义，凝聚发展共识，推进价值共创，才能做好大运河这篇大文章，让古老的大运河向世界亮出“金名片”。

深化大运河文化内涵认知，需要把握大运河文化的

当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文化符号，蕴含着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和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时期，推动大运河文化建设，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有利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有利于赋能沿线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旅融合脊梁带；有利于推动区域间统筹协调，形成文化发展命运共同体，打造区域合作样板，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立足更高远的视野，才能读懂大运河文化更深厚的价值，实现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谋篇布局。

深化大运河文化内涵认知，需要把握大运河文化的鲜明特征。大运河文化是指依托大运河而产生、发展、流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大运河文化因水运而生，“活态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千百年来，大运河虽历经改道、断航，但其航运、灌溉和防洪等功能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着大运河的流淌不息，运河文化也不断推陈出新，至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例如依然活跃的天津泥人张、杨柳青木版年画等。“融合性”是大运河另一鲜明特征，它如同一条耀眼的金绸带，将璀璨的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甚至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有机串连起来，形成了一条光彩夺目的中华文明链，并连接起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创造了一个涉及亚非欧诸洲的宏阔文化交流圈。大运河文化的这些特性启示我们：应树立历史思维、发展思维、创新思维，关注既往，也要关注未来，关注“多元”，也要关注“一体”；应大力推动创新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将大运河文化融入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使中国大运河成为“近者悦、远者来”的魅力空间，让大运河活在当下、流向未来。

大运河文化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调查分析

文化传承，是流淌在一个血液中的信仰。大运河距今 2500 年，是一条历史文化之河，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脉。2017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做出了重要指示，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关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2014 年 6 月 22 日，中国申报的大运河项目通过第 3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大运河河道保护与“申遗”点段，天津市申报的北、

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全长 71 公里申遗成功，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段河道流经天津静海、武清、北辰、河北、红桥、南开、西青 7 个区，全长 71 公里。其中北运河部分自武清区筐儿港减河与北运河连接处至三岔河口，长 48 公里；南运河部分自三岔河口至西青区杨柳青镇镇区，长 23 公里；遗产区面积共计 975 公顷。北运河、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是北方城区运河典型段落之一，也是古代河海漕转运的节点，见证了漕运发展的历史脉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

深化大运河文化内涵认知，需要把握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大运河是“在农业文明技术条件之下人类非凡创造力的杰出例证”，展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决心与勇气。通过对大运河开凿缘由、工程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大运河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执着信念，尊重规律、创新克难的创造精神，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文化态度，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智慧。这些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至今仍然是我们迫切需要传承的民族精神与历史财富。一定程度而言，做好大运河文章，讲好大运河故事，关键是要阐释好、弘扬好大运河文化的精神特质，涵养和生成更多的社会正能量。然而，当前也有一些与大运河相关的展览展示场所，“硬件很硬，软件很软”，缺少主题策划和内涵挖掘，缺少对文化精神的阐释与升华，甚至存在一些利用封建糟粕吸引游客猎奇现象，必须予以纠正。

深化大运河文化内涵认知，需要把握大运河文化的多元形态。大运河文化是“大文化”概念，根据载体性质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遗存承载的文化”，其以“物”为基础，载体是运河文物遗存、水工遗存和运河附属遗存等；“流淌伴生的文化”，其以“人”为基础，载体是与大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手工技艺）和生活习俗等；“历史凝练的文化”，其以“时间”为基础，

是大运河在数千年历史中沉淀、升华而成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推进大运河文化建设，需要对这三种文化形态区别对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遗存承载的文化应突出管控保护，通过实体或数字化形式，向人们展示千年运河的真实印记；流淌伴生的文化应突出活化利用，积极融入到旅游、影视、数字创意等产业形态中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历史凝练的文化则应强调创新传承，推进历史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圆融对接，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支撑。

深化大运河文化内涵认知，需要把握大运河文化的知识谱系。大运河的文化资源分散庞杂，文化知识浩如烟海。读懂读透大运河的文化含义，还需要深入了解大运河文化的知识本体。根据大运河历史上以“水运”为核心功能的特点，参照《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文本》的分类方法，我们可将大运河文化知识分为水道水系、水工设施、水运管理、文物遗址、经济民生、文化艺术、人物事件、运河地名、运河研究和其他相关等十大门类，并据此收集与梳理资料。这样将有助于我们构建起大运河文化的知识谱系，形成对大运河系统性、全景性的认知有助于我们做好大运河文章，讲好大运河故事，向世界光耀大运河文化，将大运河打造为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2020-6-30 经济日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 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 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 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 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 传统体育和游艺；6. 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我们通常将运河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本文将重点研究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播现状。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大运河及其流经区域人民历史创造发展的文化，并逐渐以运河为载体形成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带，它包括民俗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商贸文化、建筑文化、信仰文化等多种文化形式，充分体现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活化千年历史文化资源，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充分展示运河文化，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大运河非遗的传播可以促进当地旅游文化的开发，提升当地知名度，打造城市名片，拉动经济增长。目前我国多个地区已经通过文旅融合，让旅游市场更具有文化内涵，从原先单一依赖景观风光资源到大力开发文化资源，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因此，研究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促进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进一步打造世界级文化发展平台，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研究现状调查分析

目前，我国政府下发了一系列关于大运河的文件，例如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54号）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文物局的《大

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但以上文件仅限于大运河保护方面，对于大运河典型河道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宣传推广并未涉及。

国内外学者专家对大运河文化带的研究有四百多篇，其中近四百篇都是近三年的文献，近一年的有两百篇。其中葛剑雄关注运河文化规划旅游、环境保护等问题，王晓建议打造景观整体氛围保护。可见主要还是集中在保护利用方面，宣传等方面极少涉及。关于非遗的学术性论文有两万多篇，近一年的有两千七百多篇，并且以科普类、保护传承类的文献为主，主要关键词是文化、传承、传承人、产业化。

专门研究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15篇文献，例如《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京杭大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无锡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线性文化遗产构成及其旅游价值评价研究——以大运河浙东段为例》等。目前关于文化遗产的学术成果众多，针对大运河的文化遗产有限。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主要探讨的是保护与传承，而宣传推广作为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手段之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知网报纸关于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报道收录较少，只有个位数，主要是研究非遗本身及其传承问题。其原因可能为现代纸质报纸出版和使用较少，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话题的议论和关注较少。且已经出版发行的报纸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发展的研究阶段尚浅，缺乏大量实践案例的探究，停留在对现状的研究、整理、名录历史梳理，但就研究结果来说也是非常完善成功的。

超星百链平台关于运河非遗的报道有两百多篇。最早关于运河非遗活动的报道为2007-06-05《杭州将在运河广场大“晒”祖宗留下的宝贝》，其中关键词提取为①2007年6月9日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②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③《关于加强我市开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④第一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⑤2003年起，展开为期三年多的全市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⑥我市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数量名列前茅。综合报道运河非遗项目活动最多的报社是中国文化报。天津日报社在搜索中报道运河非遗相关报道内容多以实际展览活动为主。

新媒体调查分析

（1）以社交为主的微信公众号平台

微信公众号上关于非遗的推文众多，阅读量破万的仅占少数。其中阅读量较高的文章内容主要谈论关于非

遗的传承问题，评论也聚焦在如何更好地将非遗传承。另一方面，关于大运河的文章大多关于运河旅游，与运河沿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有关的文章几乎没有。这些公众号发展的良莠不齐，认真推广运营的还是少数。根据文章的浏览量来看，科普类文章的浏览量过低，受众更多关注的是运河沿岸的景色而非运河文化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大运河非遗文化传播工作任重而道远。以视频的方式来宣传推广似乎能取到不错的效果（例如《国潮手艺人》纪录片）。

（2）以视频为主的爱奇艺视频平台

在目前国内网络视频平台中，爱奇艺用户活跃度最高、使用时长最长，其视频内容数据具有代表性。在全视频网络搜索“非遗”共获得18.5万视频数目；其中爱奇艺来源的有12.1万个视频。内容类型包括纪录片、电视节目、个人原创视频内容。点击率最高的为纪录片，每集均介绍一种技艺，介绍非遗文化特色、非遗文化背景故事、传承人学习经历、传承地区人文现状，切入角度各不相同，时长5~30分钟不等。其次是自媒体账户自由上传的非遗文化视频，上传者多数为文化类原创视频机构和普通爱奇艺注册用户，专门上传非遗文化的原创机构很少；视频内容类别多而繁杂，有新闻节目片段、真人秀节目片段、专访、手机视频记录、课程、片段，其中新闻类内容最多，多以非遗文化展览、节日习俗、非遗项目入选名录、传承人相关新闻为主。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土豆、搜狐视频这类网络视频平台，用户没有关注上传者的习惯，更多是习惯通过搜索目标电影或电视节目来观看，或通过首页推荐点击观看。文化类视频制作相比其他视频内容，知识门槛高，素材取材较难，个人用户视频制作水平相较较弱。众多因素导致了电视节目和纪录片点击率最高、热点最高，用户个人上传的原创视频内容点击率较低，自媒体、原创上传者很难持续上传原创视频内容。

（3）以短视频为主的抖音平台

抖音平台上主要是表演、采访、展示类型的创作者。例如“非遗抖起来”该创作者主要创作非遗制作过程的短视频。其中采访南京绒花65岁的传承人赵树宪的视频点击量最高，其中点赞63.6万次，评论7375个，转发4451次。评论聚焦在表达对非遗本身的喜爱上。

（4）以新闻为主的微博平台

主要是科普、宣传非遗产品类型的创作者，例如微博非遗、侨色非遗点翠、90后扬州绒花非遗传承人、于鸿雁老于微博非遗创作者主要创作非遗科普视频、非遗作品图片。其中为“非遗扶贫·最美礼遇”公益活动宣

传的内容浏览量最高，其中点赞5058次，评论6167个，转发高达2.6万次。评论聚焦在为自己家乡的非遗发声上。

（5）官方网站

大运河智库联盟于2018年6—7月对大运河沿线进行了实地调研。截至2018年7月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公布了四批次遗产名录：2006年5月20日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2008年6月14日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2011年6月10日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2014年7月16日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53项）。

综合来看，目前政府文件、学术成果、期刊杂志等针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数量较少。并且多数专家整理归纳的资料从内容上看，关注点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及其保护上，对宣传推广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从形式上看，以学术性语言文章为主，缺少趣味性和创新性，难以引起年轻群体的共鸣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而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新媒体也只有官方运营，制作精良的内容（如纪录片、德云社抖音直播）等能够达到较高的点击率。其他自媒体内容制作相对粗糙，偏向于生活化，多是说明某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对大运河整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归纳和总结。大运河非遗种类繁多，差异性显著，如果没有整体的视角则难以概括提炼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和体系，从而品牌效应、规模效应、覆盖面都会受到影响，不利于大运河非遗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与科技时代，机械化生产的产品在标准化流程操作、成本、精细度等方面都远胜于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缺乏市场。同时，人们的审美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审美，很多产品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基于以上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稀缺，传承意识不强，传承难以为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缺乏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社会宣传未能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相关学者研究较少。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视与保护，建立大数据平台。高校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选修课程，增加学生的认知和了解，鼓励学者深入研究。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根据其平台特点发起推广活动，注意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

（2019年23期 西部论丛）

塑造大运河现代化 商业生态和文化气质

大运河全年通航里程为 877 千米，其中四分之三在江苏境内。根据其利用强度可分为两个区段：一是山东济宁—江苏镇江段，也称长江以北区段。本段航道底宽水深，是长江以北大宗散货内河主要运输通道，地处江苏、山东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肩负“后发赶超”的使命，其经济承载力接近饱和，再加上重开发轻保护，使得环境支撑越发脆弱。二是镇江—杭州段，也称长江以南区段，本段底窄水浅，两岸是繁华的生活贸易中心和运河货物交易集散中心，急剧增加的人口、过度的商业开发，再加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导致历史传承的文化气质和文明生态遭到遗失和破坏。如今，只有把现代化的商业业态和新产业新技术与大运河传统的经济形态嫁接融合，深刻塑造大运河现代化的商业生态和文化气质，才能让千年运河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力。



一、遵循“绿色、共享、共治”理念，提振大运河航运业

一是推动航道改造升级，提升大运河航运物流价值。进一步提升大运河江苏段航道标准，推进以江海联运、海河联运为特征的水水中转系统，加强大运河运输与其他运输方式的衔接协作，构筑通江达海、集约高效的综

合交通物流走廊，发挥运河运输效应，带动沿海腹地联动发展。大力发展“绿色航运”，在航道整治中引入生态理念，减少对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沿线水环境和生态环境改善。提升徐州港、宿迁港等大运河沿线港口能级，打造现代航运高地。

二是按照“共享共治”思路，增强大运河航运服务效能。加强新技术、新模式应用，不断提高大运河航运服务效能，使大运河江苏段成为通畅高效的航运线。重点在运量大、航程长的苏北运河采取智能调度系统，挖掘运河潜在运力；推进“互联网+”物流信息航务管理服务，推动传统“船流”向现代“物流”升级转型。

三是坚守绿色生态效率标准，优化大运河临港产业布局。发展大运河临港产业必须超越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路径，走生态、节能、高效、现代之路，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重点开发区域和优先开发区域，结合港口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重点载体建设，推动临港产业改造升级和集聚开发，打造一批绿色低碳、优质高效的临港产业集群，使其成为大运河沿线高能级、高质态的重要增长极。

二、活化传统文化资源，打造世界级大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带

一是丰富大运河文化品质，提升大运河文化产业的附加值和辐射力。结合大运河江苏段标志性文化遗产保护，拓展大运河文化内涵，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运河文化景区和品牌。包括系统性、全景式展示漕船、漕粮、漕盐、漕关、漕商、漕御等漕运文化，打造集文化体验、娱乐演艺、民俗购物、养生休闲、主题度假为一体的旅游与城市功能融合发展的文旅商体验消费综合体。

二是活化大运河文化资源，再现大运河传统文化特

色街区。深度挖掘开发利用运河遗产资源，发挥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众多的优势，以旅游业、生态业、文创业、演出业、动漫业、文博业、体育业、影视业等为业态载体，以运河城市历史街区、特色运河城镇、运河美丽乡村、水利风景区、大遗址公园、工业遗产地、运河文化博物馆、运河文化艺术产业园、沿运河重点文物景观等为依托，加强运河特色文化产品及品牌建设和推广，打造大运河文化产业带。

三是系统规划、整体设计，高标准打造大运河旅游品牌。对大运河江苏段旅游战略进行系统设计，既有机融入全国大运河旅游格局，同时塑造体现江苏元素的大运河江苏段旅游品牌。重点建设以运河城市、乡镇为中心，突出吴越、淮扬、楚汉、江海文化旅游区段，加强整体设计、联动和差异化发展，不断彰显大运河旅游的独特魅力和品牌价值。

三、以涵养新经济为核心引擎，拓展基于新产业新技术的大运河产业谱系

一是培育发展数字经济。大运河沿线地区发展数字经济，要走特色化发展模式。一要优化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在重点空间构筑高宽带、全覆盖的网络基础设施；二要结合临港产业等重点产业载体建设，积极发展物联网、信息通信、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互联网支撑产业发展；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型数字产业，重点发展电子商务、数字金融、智慧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进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数字媒体、系统集成与运营服务、新兴信息服务、软件外包等新业态发展；四要推进运河沿线农业“触网”，发展智慧农业，促进农村电商加快发展，发展涉农互联网金融服务。

二是推动发展创意经济。大运河江苏段各地的发展基础、特色禀赋不同，具有发展创意经济的优势。一要发展各地特色的原创IP经济，重点推进文化创意产品；二要大力推动创意设计，聚焦工业设计、城市设计、出版设计、新媒体设计、数字设计等产业，打造一批文创产业高地；三要大力发展创意体验，萃取大运河文化特质和创新载体，加快发展文化体验、文博旅游，开展具有江苏大运河特色的文化创意体验活动。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依托大运河沿线农业本底，促进田园文创、农耕体验等创意农业发展。

三是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打造大运河命运共同体。一要结合大运河沿线重点区域开发建设，通过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多种方式，推动资源共享，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和生产服务供给能力。二要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共享经济，开发面向商贸流通、教育、医疗等领域

的新型共享应用软件和平台，推动传统服务业升级再造，努力建设共享经济发展的策源地。三要大力发展公共性服务共享经济，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制度障碍，重点推动政府闲置资源和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公共设施资源共享，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大化。

四、锻造基于新产业新技术的新型供给体系，推动大运河商业经济现代化升级

一是传承运河商业文化，打造一批现代化、高品质的运河商业街区。一方面，深入挖掘梳理千年运河形成的深厚商业文化传统，创造性发展以“义”字当先、先义后利，以“信”为本、以信取利等运河商业文化，赋予其时代价值；另一方面，在一些有底蕴、有基础、有潜力的地区打造现代商贸集聚区，形成一批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商业街区、商业社区等新型商业载体，形成高端要素汇聚、市场有机生长、富有内生活力的新型商业板块。

二是结合大运河的商业特质，引入新型商业元素，发展契合运河特质的商业新业态、新模式。策应体验式消费需求，营造亲民、便利、开放式购物环境，引进商业综合体、特色商业连锁、便利店等业态，把运河文化基因与新商业因子有机结合，创造新的消费特点，形成新的商业供给。一要发展融入运河基因的网络消费，推动运河文化、生态、运输、商贸等功能与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深度融合，是网络经济对大运河基因的赋能，形成引领消费需求的数字运河经济的全新供给。

二要发展融入运河基因的艺术消费，把艺术教育培训、艺术创造、艺术交流、艺术展览、艺术品贸易等功能嵌入大运河沿线的空间载体当中，将运河基因渗入艺术产品全生命周期当中，打造一批具有运河特质的艺术产品、艺术空间和艺术样式。三要发展融入运河基因的文化消费，依托大运河独特的文化基底、丰富的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文化产业集聚区、功能区和文化产业园区，重点发展创意设计服务业、文化旅游休闲业，积极发展数字影娱乐业、新兴网络传媒业等新型文化业态，整合大运河文化消费资源，打造大运河文化消费品牌。

三是塑造运河特色空间，发展专业、智慧、生态、可持续的商业商务生态圈。依托大运河沿线城市、城镇、园区、乡村等空间载体，鼓励培育商务生态圈，为商业商务活动营造良好的小环境。重点打破传统行业价值链的价值争夺，重新定义市场边界，以独特的价值创造和盈利模式，构筑商业生态圈，实现从传统价值竞争到生态价值创造与共享的飞跃，形成具有运河特色、时代气息的商业商务生态圈。

(2019-4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论中美战略竞争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就是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自从两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结束战略对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中美战略竞争则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之所以称之为战略竞争，是因为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各自战略与政策调整以及在一些重大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等，正在使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不仅如此，鉴于中美两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与演变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 21 世纪的国际体系。



国际竞争的规范与理论视角

国际政治中的竞争是指国家之间对力量、利益、地位、影响力和声誉等有形或无形要素的争夺。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国家之间的竞争状态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基本状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间的竞争构成了世界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推动了体系的成长与扩张。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认为结构层次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单位层次上的自利动机，决定了国家对权力和利益

的争夺是国际关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自由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竞争与合作是国家实现其利益目标的两种基本行为。建构主义则认为，在洛克式无政府社会（亦即当下的国际政治状态）中，竞争是国家行为的基本逻辑。因此，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都表明，竞争是理解国际政治的重要视角。

在国家间关系中，竞争往往与合作和冲突并存。“从整个国际关系到行为主体相互关系，几乎总是处于国际竞争、合作与冲突的混合状态之中，越来越难以找到单一而纯粹的状态，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或在不同的领域、问题上竞争、合作与冲突同时并列。”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竞争不仅是普遍存在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竞争可能转化为冲突，也可能转化为合作。当竞争双方都认为争夺中的利益对己方关系重大，不可放弃也难以妥协，就会不断加大资源投入，使得竞争力度不断加剧。尤其是当竞争的着力点转向“压制、伤害以致消灭竞争对手”时，竞争就会走向对抗和冲突。而当竞争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基于自身能力和收益判断决定减缓甚至终止竞争，或竞争双方在利益权衡上从追求相对收益转向追求绝对收益，竞争就有可能转向合作（共赢）。

不同于一般性国家间竞争，战略竞争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战略竞争往往在地区或全球大国间展开。第二，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关系到各自在地区或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既是力量之争也是地位之争；战略竞争不仅涉及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还涉及制度、价值观、秩序安排（如国内政治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国际秩序）等。也就是说，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单元层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更关系到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第三，战略竞争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双边范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冲击。第四，正如杨原所指出的，大国战略竞争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即以

利益交换获取和竞争权力以及以武力胁迫获取和竞争权力，由于主权规范和相互确保核威慑的存在，利益交换是当今大国权利竞争的基本范式。

对竞争规范和理论的梳理对我们研究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重要启示：第一，战略竞争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要正视两国间竞争加剧的现实。第二，中美竞争带有 21 世纪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上的大国竞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其内涵、特点和本质，更好地认识和驾驭竞争。第三，鉴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中美战略竞争不仅会调整两国间的利益关系，还会对国际体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第四，虽然中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形态和演变取决于两国的竞争行为，其后果也不是预先注定的。中美双方应积极地管控竞争，使竞争的建设性最大化、破坏性最小化。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在特朗普执政后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力量、利益和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宣告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宣称要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重新塑造对华关系。面对中国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相结合，催生了特朗普政府加剧对华竞争的行为。自 2017 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吹响对华战略竞争的号角后，美国对华竞争在经济、政治、外交、人文交流以及国际秩序等领域快速展开，其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见。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的重点是在经济、地缘政治和政治领域，对这些领域的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特朗普政府对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认知及其行为偏好。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观的特点是“美国优先”“经济第一”，经济安全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内容。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受到了在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下的经济竞争的挑战。”报告甚至将这些挑战称为“经济侵略”，强调美国“将不再对违规、作弊或经济侵略视而不见”。特朗普政府宣示，其应对经济竞争的目标是促进“自由、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系”，“只有当国家间共享价值观并建立公平、互惠的关系，竞争才是良性的。任何国家违反规则获取不公平的优势时，美国将采取强制措施”。

中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美国的头号经济竞争对手。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指责聚焦于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往来”以及“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在

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提出的要求涵盖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和实施机制等广泛内容。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竞争聚焦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和市场开放，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商品采购、降低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开放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市场。二是阻挠中国的技术进步，放慢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如要求中方停止“强制”来华外企技术转让、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放弃实施“中国制造 2025”计划，限制中国对美投资，阻断中美技术研发合作，强化对华技术出口控制，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等，其中最为极端的是对中国电信企业华为的全球围堵。三是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2017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称：“中国经济没有充分地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运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国家与市场 and 私营部门的关系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经济。”美方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普遍指责集中在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不以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做法上，认为中国借此在同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基于这一逻辑，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谈判中提出了大量涉及所谓“结构性问题”的严苛要求。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行为受到不同经济思维的影响。第一种是经济民族主义，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崇尚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对华政策上体现为重视降低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把加征关税作为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第二种是经济现实主义，它关心的是确保经济交往不会增强对手至关重要的能力（特别是技术能力），防止对手通过经贸联系缩小与己方的实力差距，因此在经贸关系中追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强化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严格审查中国对美投资、打压中美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切断在高科技领域的中美供应链、通过迫使高科技制造业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出而重塑全球产业链等。这一派的主张受到国家安全界的支持。第三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它在全球化的环境中看待对外经济交往，主张按照多边（同时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谋求更多地进入国外市场。在对华政策上，要求中方更多地开放市场（特别是服务业）、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改善美资在华商业环境等。这三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所导致的对华经济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抱怨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分歧点则在于：经济民族主义主要关注传统的商品贸易，经济自由主义关心扩大在华服务业市场份额，

而经济现实主义则寻求中美在高技术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脱钩,限制中美经贸联系。就其所偏好的结果而言,前两者有可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业市场占有率更大的份额,从而进一步扩大中美经贸联系,后者则会严重削弱中美经贸纽带。从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看,其试图在对华经济竞争中照顾上述不同经济思维的政策诉求,这使得中美博弈更加复杂化。

虽然特朗普对华经济竞争行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价值数以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但影响最大、后果最严重的却是在技术领域。特朗普政府在高科技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对华“脱钩”以及对华为的打压正在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第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正处于关键阶段,而美国的技术限制与封锁势必会放慢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第二是中美在科技领域的“脱钩”趋势。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同步,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而不断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对华“技术脱钩”行为使中美技术合作的势头严重受阻,迫使中方以更大决心和更多资源投入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中美“技术脱钩”的趋势正在生成,长远而言,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渐行渐远。第三是“技术冷战”的爆发和世界分裂为不同的技术应用阵营。美国对华“技术脱钩”和中国的自主创新可能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开展一场“技术冷战”,这将加速隔断中美两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并波及全球的技术供应链。以5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将沿着不同的技术路线、法规和标准发展,以美国和那些在其压力下拒绝中国技术的国家为一方,以中国和那些采用中国技术的国家为另一方,两个阵营泾渭分明、分道扬镳,全球化的世界沿着技术断层线走向分裂,这一断层线还可能会延伸到投资、贸易甚至金融领域。中美技术竞争由此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面对特朗普政府将竞争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大力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做法,中国通过适应、引导、调整等方式予以应对。首先,正视竞争的现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中美之间在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竞争,这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现象。中美竞争和分歧从来都存在。其次,强调要开展具有“积极意义”的竞争、符合规则的竞争和良性竞争,要摒弃竞争中的零和思维。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同意把竞争作为中

美关系的基调,而是主张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一味放大竞争,就会挤压合作的空间。聚焦扩大合作,才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是两国对世界承担的责任”。最后,面对中美竞争加剧的现实和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可能,中方也在经贸、科技、外交、安全、政治和人文等领域积极布局,以有效应对来自美方的挑战,更好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美竞争的实质与管理

在梳理了后冷战时代中美竞争关系的演变后,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什么,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为何以及应如何管理中美竞争。

(一) 中美竞争的实质

学术界对于中美竞争的实质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主要是领导地位之争。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历史上曾在世界或亚洲拥有的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必然会带来中美之间的竞争。第二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的核心目前是潜在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较量,中国让美国倍感竞争压力和威胁的是经济领域的实力和发展势头。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主要是安全之争,因为美国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会挑战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体系。第四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是多维度的,涉及经济(包括贸易、投资、技术等)、安全、意识形态、社会、地缘政治、国际制度以及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

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和广泛且重大的利益分歧,中美竞争具有全面性。事实上,随着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的推进,中美全面竞争的图景已然显现。但是,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霸权之争,也不是安全之争,而是经济社会之争。这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国际体系因素。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内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有该体系的明显特征。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支撑国际体系的政治—安全逻辑逐渐弱化,而经济、技术因素对体系的影响大为强化。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正如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中美竞争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其次是中国战略选择,即和平发展和不称霸。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基本国家战略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国际地位,

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而非地缘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与此同时，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也反复强调中国无意追求霸权、无意争夺势力范围。这一基本战略选择决定了中国虽然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但不会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不会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更不会同美国争夺地区或世界范围内的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中美竞争的性质。最后，虽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中美之间在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在 21 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决定中美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高低的关键是看谁的经济发展得更好、谁的治理能力更强、谁的治理效果更佳，而不是看谁能在军事上压倒和征服对方，也就是说，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将是各自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治理能力，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实力和同盟体系。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

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些重要特点。第一，竞争的实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而不是霸权之争或传统的军事—政治权力之争。第二，尽管中美竞争具有大国权力竞争的某些特征，但由于其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这使得中美竞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显著地低于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国竞争。第三，中美在经济领域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会成为制约竞争的重要因素。经济相互依赖不会消除竞争甚至可能引起或者加剧竞争，但却有助于确定竞争的边界，缓解冲突和对抗。第四，中美竞争的结局不会是非此即彼的。即使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美国仍在科技、金融、创新能力、高等教育以及军事实力等诸多方面保持其相对优势。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中美博弈不太可能会重复历史上霸权更替的形式，更可能的前景是：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却不能全面取代美国；而美国既不能避免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也不能全面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双方只能在竞争中共处，在共处中管理竞争。

（二）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

中美战略竞争将重塑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形态究竟为何，当下在中美学界和智库人士中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和认知。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将是战略对手甚至敌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美国

保守派智库人士（姑且称之为“冷战派”），他们主张美国要综合运用外交、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强化对华军事和外交压制，限制经贸关系的发展，在经贸领域实现“部分脱钩”，在政治上妖魔化中国等。“冷战派”口头上谈论中美竞争，心里想的则是冷战式的对抗，要让中美走向“新冷战”或“准冷战”。这派观点与特朗普政府中对华鹰派的立场相吻合，对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较大。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持这种观点的在中美学界和智库中占大多数（姑且称之为“竞合派”），他们认为：一方面，中美两国将在经济、军事、外交、高科技、治理模式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双方又不得不在广泛的领域内合作，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反恐、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等。因此，中美互动主要表现为竞争与合作或竞争与接触交织，双方应谋求“竞争性共处”。值得注意的是，“竞合派”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观点差异，比如有些主张中美关系是竞争主导型，竞争为主、合作为辅，有些主张要根据实际情况保持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还有些认为中美之间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

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在美国朝野似乎已成为共识，而竞争思维的强化也显著影响了美国对华互动方式。随着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变化，中方也在做出相应调整，这必然会扩大和深化中美竞争的范围与力度。但是竞争并不能完全改变中美利益关系的基本结构。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共同利益——不管是经济的、安全的还是社会人文领域的——并未消失，为维护和促进这些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依然存在。正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指出的那样，“竞争是国家间关系中的正常状态而非不正常状态”，它“无须排除对特定的共同利益——集体的或是普遍的利益——的认同”。从长远看，两国政策精英对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共同信念会引导和塑造双边互动，防止竞争排挤合作或滑向冷战式对抗。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技术、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挑起的对华摩擦前所未有，但随着其负面效应的日趋显现，最终只会再次证实中方反复阐述的基本道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将有助于厘清对中美竞争限度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提升美国对华经济依存度。这些都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回归竞争加合作的基本面。

（三）如何有效管理中美竞争

虽然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的演变及后果

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选择与互动。特朗普政府加剧对华竞争、偏好恶性竞争手段，使得管理中美竞争成为十分迫切的挑战。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全面性和重大性使其蕴含着重大风险。在战略层次上，存在着中美走向长期性、系统性对抗的风险。在战术层面，军事领域的竞争存在着擦枪走火的风险，经济领域的竞争存在着经济交往大规模缩水、经济联系大范围“脱钩”的风险，政治领域的竞争存在着走向意识形态对抗的风险。有效管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要减少和防范上述风险，还要给中美合作留出足够空间。

1、树立正确战略认知

有效管理中美竞争首先需要双方确立正确的战略认知，包括竞争的时代背景、竞争的限度以及对方的战略意图。中美竞争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全球格局演变的结果。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力量和影响力优势的相对衰落加剧了中美竞争。竞争也是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在短暂而不可持续的一国独大局势转瞬即逝之后，世界又恢复了竞争的历史常态”。大国竞争正塑造“竞争性多极”的国际格局。竞争应当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挑战，而不是试图抵制变化的大趋势，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当新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时候，美国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基本任务就变成对它的地位的改变做出反应”。如果美国仍然信奉优势战略，从霸权争夺的视角看待中美竞争，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正当的利益诉求一味采取遏制、打压的态度，美国就误判了这场竞争的性质，就不能胜任这场竞争。同时也要看到，21世纪的中美竞争是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的大国竞争（两国都受到体系因素的制约），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中美之间形成了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竞争（中美两国都承受不了走向全面军事对抗的风险）。因此，中美竞争的底线或边界就是不割裂现有的国际体系、不严重破坏现有的国际规范，防止中美经贸联系大幅缩水甚至中断，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和升级。此外，在大国竞争中，现存霸权或主导国容易夸大来自崛起国的挑战，并据此做出反应，这往往会加剧甚至恶化竞争。因此，美国避免以偏执心态任意夸大和渲染“来自中国的威胁”至关重要。

2、增强机制建设

机制建设是管理中美竞争的重要抓手，它需要双方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多层次、相互支撑且有效衔接的机制。第一层是外交互动机制，包括首脑互动机制、战略对话机制以及工作层面的磋商机制等。首脑互动机制

主要发挥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战略对话机制旨在增进信息分享、降低不确定性和管理相互预期，工作层面的磋商机制则更多聚焦两国间互动议程的设置、商讨推进具体领域的合作和对分歧的处理办法等。第二层是建立信任措施机制，如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这些机制旨在增加两军之间对对方意图的准确了解，减少误解误判以及避免意外事件发生。第三层是危机管理机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有效的危机管理能够防止对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冲击的意外事件发生，降低危机事件对两国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在危机管理的预防、准备、反应和恢复四个阶段中，中美尤其要加强在预防和反应阶段的沟通协调，要发挥现有机制（如中美首脑热线、中美国防部直通电话）的作用，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完善双边危机管理机制，确保沟通机制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可靠性。此外，中美还应加强对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探讨，力争形成重要共识。

3、构建健全的竞争规范和文化

构建健全的竞争规范和文化对推动良性竞争、避免恶性竞争也至关重要。在国际关系中，文化和规范对行为体的认知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塑造与指导功能。就中美竞争而言主要体现有五点：第一，双方都应该认识到，长远而言决定竞争结果的是能否通过竞争提高自己而非削弱对方。归根结底，关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明智的制度和政策设计、良好的执行力是提升各自竞争力的关键。第二，双方应有更大的格局和关怀，即不仅要通过竞争提升自己，还要推动21世纪国际体系的进化，这意味着应该合理调整国际机制的制度和规范，同时要尽可能避免撕裂或瘫痪现有的国际机制。第三，双方在竞争中保持谨慎、克制并在必要时妥协。双方应该明白各自力量的限度，承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手段的有限性，不越过底线或红线，不将对方逼到墙角。第四，双方应尽可能将竞争局限在利益之争的范围，避免扩大为制度之争特别是意识形态之争。众所周知，冷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的成分，然而正如加迪斯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美苏两国曾为了保持各自在其中具有重要利益的国际体系的稳定缓和了意识形态竞争，将体系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利益之上，中美竞争也可从中得到一定启发。第五，要重视外交的作用。中美竞争主要是经济社会之争而非军事之争，竞争也不等同于对抗和冲突，因此在竞争中要积极运用外交手段促进沟通、谈判、协调以及合作。外交手段的充分与合理运用能够减少中美竞

争所带来的冲突风险。

中美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这使得中美竞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显著地低于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国竞争，但中美竞争的全面性特征又使其隐含着多重风险，并给认识和管理竞争带来了复杂性，因为在特定阶段中美在某些方面的竞争（如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等）可能会比较突出和尖锐，从而模糊双方对竞争本质的认识，影响各自对竞争关系的驾驭。当战略竞争的大幕开启之际，中美双方都应该准确把握竞争的本质特征，避免扭曲竞争的性质；双方还需要明了竞争关系并不是中美关系最坏的可能，它本身有很大的演变空间，良性或恶性的发展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塑造；双方尤其需要认识到，竞争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应该在竞争的同时保持和扩大基于双边与多边共同利益的合作。

中美两国在对竞争关系的塑造中将发挥不同的作用。美国虽然具有力量优势，但缺乏理念上的引领性。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历

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结盟、霸权争夺、军备竞赛、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角逐等成为美国的“战略习惯”，对霸权地位的痴迷也令一些美国政策精英更倾向于以零和思维看待与中国这样具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战略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在力量上与美国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但在理念上具有进步性。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得益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这一重要的经历使得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成为中国对外行为的价值偏好。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提出了发展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倡议，它体现了一个新兴大国对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向往，更体现了一个新型大国理念上的进步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也必须对中美竞争关系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引领作用。塑造良性竞争的中美关系、推动国际体系的良性转型，这将是 中国对 21 世纪国际政治的重要贡献。（作者：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20 年 5 期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上接第 20 页）

第二册：欧洲文学。欧洲文学从公元前 8 世纪荷马史诗产生起算，至今有约 2800 年历史。欧洲各国因地域、人种、语言、文化、历史相同或相似，产生了整体上的“欧洲文学”，取得了辉煌成就。近代以来，欧洲文学居于世界文学发展前列，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应居于“同心圆”的第二圈。

第三册：美洲文学。美洲距离中国较远，文学上彼此互相影响。美洲文学的产生晚于亚洲文学和欧洲文学，大约在 20 世纪后半期才形成声势。将北美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合并为“美洲文学”，是基于其共同性大于差异性的考虑。美洲文学因此居于“同心圆”的第三圈。

第四册：非洲文学、大洋洲文学。非洲文学与大洋洲文学不是一个整体，只因其近代历史较短、与中国文学相互影响的程度低于另外三大洲文学，所以将其合并居于“同心圆”的第四圈。但 20 世纪下半期以来，非洲文学和大洋洲文学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获得巨大成功，中国文学与非洲文学、大洋洲文学的关联逐渐加强，理应受到更多重视。

第五册：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后殖民文学。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后殖

民文学等文学群体或类型迅猛发展。这三种文学的共同特点是跨界，即在不同文化间穿梭、在洲际和国别间流动或散居、在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间寻求对话与认同。其作家的国别和洲际特征往往比较模糊，充满了混杂性。收入本卷的将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这一类作家的作品。基于以上理由，本书将这三大类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同心圆体系”的最外围。

对当代中国而言，70 余年的世界文学知识体系与欧美有很大不同。我们对世界文学的学习长期与追求现代化的启蒙教育联系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孕育、发展出庞大的世界文学知识系统，形成了独特的世界文学观。21 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格局和中国文学的全球使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定于一尊的世界文学观念。“同心圆”的世界文学观念及据此新编的《世界文学作品选》，能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纽带，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编织进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中，从而呈现新时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视野，满足中国文学日益增长的全球抱负与需求。

（2020-07-13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从当前经济形势看我国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波谲云诡，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下，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科学分析研判今年上半年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会更加认识到加快促进这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极端的必要性，应该成为未来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和着力点。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运行呈现出深V型恢复变化态势

从经济运行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呈现出深V型恢复的变化趋势。从中国经济一季度的数据看出，虽然总体上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降6.8%，但是如果对比3月份和1—2月份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还是就业、投资、消费等其他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增速反弹、降幅明显甚至大幅度收窄的特点。而4月份和5月份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正在从这次强度前所未有的巨大短期冲击中逐步恢复过来。市场预期保持平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连续3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以上。也就是说，截至5月份的数据，1—2月份的数据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谷底”，3月份以后逐步开始恢复，基本呈现出深V型恢复的态势。

从4、5月份的经济运行指标，再考虑到6月份疫情流行曲线状况和我国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虽然北京出现了新疫情会有一些影响，但初步判断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大概率能够转正。如果不出现太大的突发情况，下半年应该可以逐步回归正常水平，明年迎来中高速增长。但5月份不少指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这表明中国经济深V型恢复基础还有待进一步筑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着力稳企业保就业，狠抓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纾困政策应该保持到年底，同时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生态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落实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政策，继续坚持“短期纾困与长期创新相结合”的政策思路。

从国际经济看，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和对中国供应链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持续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和5.2%。从贸易上看，一季度全球贸易额同比下降3%，二季度WTO货物贸易晴雨表指数为87.6，创历史新低，WTO预计二季度全球贸易额同比下降18.5%，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二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额将比一季度下降26.9%。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看，一季度美国、欧元区和日本GDP同比下降4.8%、3.1%和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GDP将分别萎缩8%、10.2%和5.8%。面对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衰退，各个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超大规模的经济救助措施，这将有助于经济逐步恢复，由于迄今为止美国等国家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再加之医学界有预测认为疫情还可能在今年秋冬季卷土重来，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将十分艰难，甚至有可能呈现W型恢复的基本趋势。世界经济的持续衰退和可能呈现出的W型恢复态势，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深V型恢复态势与世界经济可能呈现出的W型恢复态势之间会产生巨大的“不同步缺口”，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个“不同步缺口”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国际经济循环以及我国经济呈现深V型恢复趋势的基础。

疫情冲击以及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更为长期的影响在于可能会冲击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在全球的地位。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巨大冲击。

对于中国产业而言，1—2月份主要表现是，中国国内疫情暴发后中国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率先按下暂停键，对全球供应网络形成冲击，出现大量延迟交付和订单萎缩；进入3月份后，日本、韩国，进而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欧洲地区、北美地区都面临巨大疫情考验和挑战。虽然中国复工开工率不断提升，但此时外部疫情开始严重影响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疫情对中国的冲击与对其他国家的冲击开始产生交互性的负面影响。这必然从国际循环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影响。

不仅如此，从积极应对疫情冲击角度，各国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的调整，这必然会加剧去全球化的趋势。由于近些年贸易保护主义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全球供应链已经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而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巨大冲击，会加重这种趋势，全球供应链布局会面临巨大调整可能，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与全球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我国在考虑短期“六保”中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必须从长期角度思考如何在产业链安全和产业链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从加快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看，我国要从疫情冲击下的“被动型”转向政策驱动下的“主动型”

如果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量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国内经济循环主导的基础条件。一方面从生产供给角度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另一方面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2019年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总体而言，我国已经步入到工业化后期，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形成了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的要求，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效率基础。

但是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经济开始内卷化。这里必须避免一个重要的错误倾向：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和一些国家努力推动“去中国化”等原因，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短期会受到明显抑制，我国的供应链会受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而言国内经济循环量“此消彼长”会大幅提高，由此就贸然判断或者宣布我国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互相促进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这种被动形成的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并不是我们期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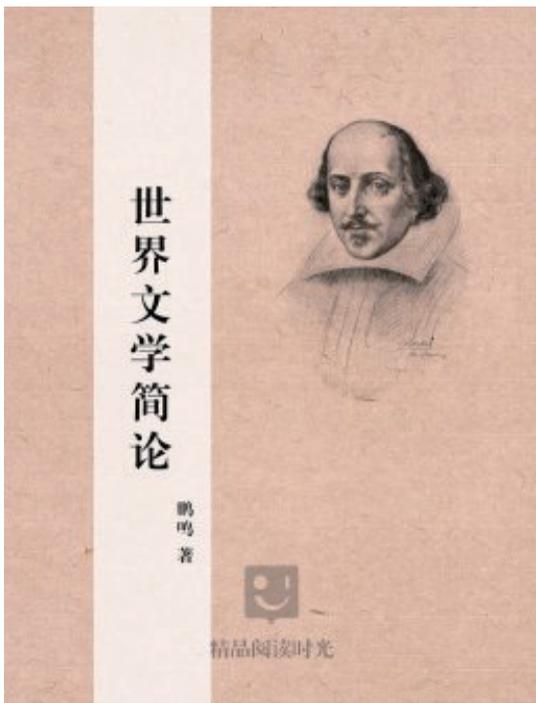
们要实现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积极拓展国际循环、国际循环的流量保持增长的前提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供给质量、挖掘国内巨大消费潜力形成的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实现这样的国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继续对外开放、进一步拓展外资外贸工作前提下，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供给质量，挖掘我国消费潜力，在提高我国国内自我经济循环量的同时，还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这本质上也就是促进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从“被动型”转向“主动型”的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种转换不仅仅是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战略出发点和政策思路导向问题，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值得十分强调。

“主动型”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围绕着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对疫情冲击，当前在政策安排上，一方面从需求侧入手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重点是加快“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的投资和积极出台一系列针对居民的消费激励方案；另一方面从供给端发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我国经济循环中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经济供给质量。具体而言，现在有必要下决心对长期以来阻碍国内经济循环、老生常谈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机制问题进行“动手术”。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一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要按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切实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通过推进公益性企业回归公益定位实现国有经济战略功能，通过推进商业类企业回归企业属性实现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久。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建立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政策体系和实施经验都已具备，改革再进行试点的意义已经不大，需要全面切实推进，国资委要放开“试点权”，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各方面改革。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第一季度经济下降6.8%、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6.7%，而银行业利润率却保持了增长5%。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金融让利实体经济。这要警惕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借口来保证金融业的利益，重视金融的短期风险与实体经济长期风险的平衡，下决心解决阻碍我国经济有效循环的“脱实向虚”的长期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2020-7-12 爱思想）

新时代世界文学 教材观念创新

自歌德 19 世纪 20 年代第一次对“世界文学”观念进行论述以来，近 200 年间，这一承载着人类文学大同与民族文学荣耀理想的观念常说常新。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世界文学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引发了持久的讨论，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前沿话题。与此同时，国内的外国文学教材建设也不断尝试吸收世界文学新观念、新方法，力图在思路、架构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创新。



外国文学教材结构观念的演进

从 1949 年到 1979 年，中国正式出版、供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使用的教材只有寥寥数种，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选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七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1959 年版），

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四卷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1—1964 年第一版，1979 年第二版），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上卷第一版，1979 年下卷第一版）等。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编写的各种油印本、铅印本讲义非常多，20 世纪 80 年代正式出版的外国文学教材多以这些油印本、铅印本讲义为基础。统而观之，这 30 年的外国文学史架构有三种模式，可分别概括为“两大板块”“三足鼎立”和“一条线”。

所谓“两大板块”，指欧洲（或欧美）文学与俄苏文学（或苏联文学）并立。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欧洲（或欧美）文学与俄苏（或苏联）文学通常分开教学，教材也分别编写、互不包含，由此形成了欧洲（或欧美）文学与俄苏（或苏联）文学两大板块并立、并重的局面。这是 50 年代高校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高度重视俄苏文学的结果。

所谓“三足鼎立”，指在欧美文学、俄苏文学之外再加入东方文学。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东方文学逐渐进入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体系。1958 年印行的《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其中的“外国文学”分为“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两部分。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单独印行。这标志着我国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体系中欧美文学、俄苏文学、东方文学三大板块已经成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 1963 年编写了《外国文学讲义（亚非文学）》（铅印本）。在 60 年代，还有多所高校编写过油印本和铅印本的东方文学讲义。

所谓“一条线”，指将欧美、俄苏、东方三大板块合而为一，统一归纳到一个外国文学史发展序列中。1949—1979 年，唯一采取“一条线”体系包括外国文学史的教材是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这部作

品选共4卷,分为古代部分、近代部分上、近代部分下、现代部分,上起《荷马史诗》,下迄20世纪20年代,将欧美文学、东方文学、俄苏文学三大板块贯通于一个时间序列中。尽管该教材限于体例,“史”的线索无法具体论述,但它提供的外国文学史基本框架和分期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合理、最先进的。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教材建设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出版的外国文学通史类教材有100多种,各种通史类外国文学作品选本也有70余种。这些教材的框架结构大致有两种模式:“东西二分”和“合二为一”。所谓“东西二分”,指东方和西方两大板块所形成的外国文学史结构,最具代表性的是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和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及《外国文学史》的“欧美部分”和“亚非部分”。所谓“合二为一”,是把东西方文学合并,按照一条历史线索贯穿下来。这类教材有很多,如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多位教师合编的《比较世界文学史纲》、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文学史教程》、聂珍钊领衔主编的马工程教材《外国文学史》等。这两种模式的教材适应了中国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不同层次的需要。“东西二分”的模式凸显了东方文学的地位,在现阶段更方便教学;“合二为一”模式则整体感更强,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也更能体现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

基于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架构

任何世界文学史,其撰写者都会以不同方式呈现或观照本国文学的地位和意义,这一点中外皆然。有的教材会直接把本国文学纳入其中,像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文学史》包含俄罗斯文学,美国的《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和《诺顿世界文学作品选》包含美国文学,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杨烈的《世界文学史话》包含中国文学。一些教材虽然本身不涉及中国文学,但会通过隐喻的形式凸显本国文学的地位和意义,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东西二分”的文学史框架结构。这种结构模式在相当长时间里被认为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强调突出东方文学的地位,提升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文学的地位。

21世纪以来,国内各种外国文学史和作品选类教材层出不穷。在强调中国主体立场、凸显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方面,最突出的当属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文学史教程》和署名“方华文”主编的《世界文学经典》。这两部教材把创新定位在“多元文明”。主编把世界文明划分为“八大体系”,认为世界文学是以这八大文明体系为代表的民族和区域文学的不断交汇与融新。这种世界文学史观

打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史模式,赋予各个主要文明体文学以平等地位。同时,方汉文在《世界文学史教程》中还给予中国文学重要的甚至特殊的地位,在其五编的内容中,只有中国文学与源自古希腊罗马传统的欧美文学始终以专章的体量呈现,保有了完整性与连贯性。

观察上述教材中关于中国文学的呈现模式,都既有优良也有不足。将中国文学包含其中,能够凸显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但世界文学史本身的结构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占有过多篇幅。世界文学史写作要追求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但当中国文学在具体的文学史叙述层面与外国文学摆在一起时,类同与影响关系的探究往往会伤害中国文学的具体性和独特性。而“东西二分”的结构本身,很大程度上仍然体现了二元对立思维,凸显的是对抗、对照、对等。在21世纪,这是否仍是最有效的世界文学史框架模式,需认真思考。

“同心圆”的世界文学观及其应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编《世界文学作品选》,其依据的是被称作“同心圆”的世界文学观,力求在编选架构上进行创新。“同心圆”本是一个数学概念,在此引申为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架构。此处的中心不是作为“领袖”意义的中心,而是基于与中国的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作为主要依据安排“同心圆”的结构顺序。在这个“同心圆”架构中,作为中心的中国文学作品并不入选,却是这个关系结构的枢纽、标准、尺度,因此无处不在。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逐渐建立起了持久、多样态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先后强弱主要由地理空间的远近决定:先是亚洲,然后依次是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最后是全球时代的跨洲际文学。这一点又与世界文学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大体一致。在此构架之下,新版《世界文学作品选》共分五册,以地理单位的“洲”和“跨洲际”为最大分册单位,以与中国文学、文化发生联系之先后强弱、体现世界文学的整体结构和发展前景等因素为排序标准。这五册书依次为:亚洲文学卷、欧洲文学卷、美洲文学卷、非洲文学与大洋洲文学卷,及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后殖民文学卷。

这套书选编的具体依据是:第一册:亚洲文学。亚洲是最早产生世界文学的地区,也是与中国文学发生联系、相互影响最早的地区,地理上与中国最近。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与中国文学分享更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价值,理应居于“同心圆”的第一圈。

(上接第11页)